

學海軼聞趣事(十)

● 李梅山

蒲松齡自負讀書多

袒腹躺臥路旁曬肚

清朝時，有位官員叫洪家軍，家中藏書萬卷，遠近聞名，但他並不誦讀。有一年秋天，他怕書霉爛了，便將所有書本搬了出來，放在地上曬太陽。恰好是日蒲松齡路過此地，看到此情景，不禁感慨萬分。

他走到書房，躺了下去，敞懷閉目曬起太陽來。管曬書的家人走過來問：「你是誰，躺在這裡幹什麼？」蒲松齡說：「我也在這裡曬書呢！」家人迷惑不解，以為他是白痴，於是入屋通報洪家軍。

洪家軍自覺好笑，急忙從家裡跑出來，走上前問：「你說在這裡曬書，你的書在哪裡？」蒲松齡看也不看他一眼，用手摸著肚皮說：「我的書都裝在這裡面。」洪家軍聞言，羞愧滿面，在圍觀者的譏笑聲中灰溜溜地走回家了。

後來才有人認出，這位肚皮藏書萬卷的人原來是『聊齋誌異』的作者蒲松齡。

梁啟超死於腎開刀

不信中醫診斷無恙

北京人譽為中醫「四大名醫」之首的蕭龍友先生，在北京行醫五十年。患者中，上至孫中山、蔣介石、吳佩孚、馬占山、梁啟超等，下至一般平民百姓，都無不對他敬若賢士。

梁啟超與蕭龍友相處甚篤，經常往來。時值梁啟超暮年，正於清華執教。一日，他偶覺腰部疼痛，欲作檢查。梁先生素信西醫，故經往協和醫院作腎造影。造影顯示左腎有黑斑一處，經外國醫生斟酌竟確診為腎子腎炎。當時，「梁琴」剛剛問世，經X線照射，猶如親見肺肝，莫說崇信西醫者，即使一般國人亦當堅信不移，於是梁啟超就決定恪遵醫囑切除左腎了。手術前，梁啟超請蕭先生一診，徵求意見。經切脈後，蕭先生一味搖頭，斬釘截鐵說「腎臟無病」！並勸梁啟超勿草率從事，否則後果堪慮！

奈何梁啟超不以為然，還戲謔說：「戰士死疆場，教師死課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旋

赴協和手術。孰料結果竟為蕭先生不幸而言中，手術後，見腎囊完全健康，而梁啟超卻因此而溘然長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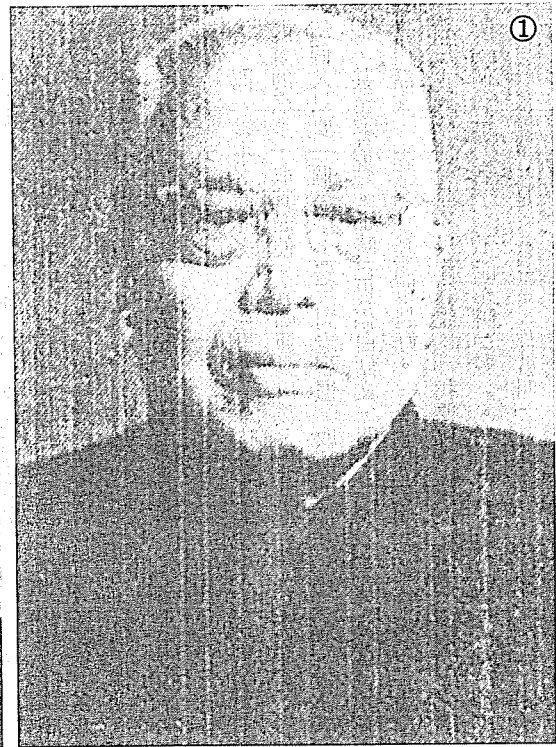
聞一多稱文姓後裔

想改名卻多了一字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聞一多出生於湖北省浠水縣巴河鎮的鄉下。

聞一多的父親聞固臣，是清末的秀才，為人忠厚。他接受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思想影響，贊同變法維新。聞家流傳這樣的傳說：「宋代文天祥英勇抗敵，保衛國家，後被奸人所害，將要滿門抄斬。大禍臨頭的關鍵時刻，文家就有人改姓聞，在江西隱蔽下來；以後又有人從江西移居到浠水。所以浠水聞姓人士，都以他們有文天祥這位先祖為榮。」

聞固臣有五個孩子，聞一多行四。大哥名聞展民，二哥聞藜青，三哥名聞巡周，弟弟名聞家駒。在這個大家庭中，聞一多這輩的嫡堂兄弟共十七人，他行十一。為了稱呼起來方便，聞一多



①治史有成的史學大師徐中舒教授。

②撰寫古代神話有成的袁珂教授。

③為故宮博物院奠基的易培基教授。

④明清社會經濟史家傅衣凌教授。



的弟弟們，習慣上叫他「一哥」；比他小一輩的，就叫他「一叔」。聞一多的原名是聞亦多，這是按家族的排行取的，又名家驊，號友三，他自己也用過友山。

一九二二年秋天，清華學校在湖北招生兩名。它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念好了就能「出洋」，這在當時很吸引人，因而這個學校很難考。聞一多毅然去報考。初試在湖北省舉行。作文題是「多聞闕疑」。聞一多從小愛讀梁啟超的文章，就模仿梁啟超的筆法寫了一篇，得到主考人贊許。然而，他其它學科的成績一般，最後被定為備取第一名。這使他有到了到北京參加複試的機會。聞家的歷史上，雖有不少人中過舉，但這次卻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進京赴考，全家頓時又高興又擔心，忙忙碌碌做各種準備。聞一多專注於複習，他彷彿不知道氣餒，他很自信。他以為反正複習功課總是有好處的。這年冬，他赴京參加複試。家裡不放心，讓他的一個哥哥伴送他進京。火車上，還幫助他複習英語。最後，他以湖北省的第二名被正式錄取了。

聞一多本名聞亦多。他在投考清華時，改用聞多的名字，取其簡便。五四運動以後，他主張每個人只要一個名字；要反對老習慣，取消字、號，甚至取消姓。那時已提倡白話文，聞一多擁護白話文，主張名字越簡單越好。一天，聞一多對班上同學潘光旦、吳澤霖說：「我要取消姓，改一個簡單的名字，不能光叫「多」。」吳澤霖說：「最簡單就是「一」字，你就叫「一多」吧。」潘光旦接著說：「對「一多」這個名兒好。」

「這樣，他就算改了名，不再叫姓，從此同學都叫他「一多」。學校並不承認，一直到他畢業、留學，正式的名字還是聞多。按照中國的習慣，姓沒能取消，「一多」兩個字，同學們又叫習慣了，以後，他的姓名就成了「聞一多」。原來以為可以簡化，結果反倒增加了一個字。

徐中舒治史有一套

卓然師表人人欽慕

當今史學界公認的史學大師徐中舒已在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達五十年以上，他數十年如一日，在學術研究上，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取得了卓越的成績，發表了一百二十多篇論文和多部專著，共計三百多萬言。他的論著內容翔實，論證嚴密，宏富精深，多有創見，不少學術見解至今仍為國內外學術界所讚許。

徐中舒初名道威，字中舒，以字行。安徽安慶人，生於清光緒二十四年，上代務農。給徐中舒一生影響最大的是他母親，三歲時，他祖父、父親相繼去世，徐母只好帶著他進了當地一所慈善救濟機構。徐母沒有讀過書，但很有志氣，一心要把兒子撫育成成人。徐中舒純謹厚重品行的養成，與母教之嚴大有關係。

一九二五年，他以第五名的成績進了清華國學研究院。他對王國維、梁啟超等人講授的課程都感興趣，特別是對王國維講古史考證精審、見解新穎心領神會。五年後，由於陳寅恪的推薦，他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又

升為研究員，他在那裡八年，以出色的成果獲得了學術界的承認。後來也先後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七校執教，而自一九三七年起則一直在四川大學任教授。

他的史學研究分成二個部份，一是史學，先秦學、明清史和四川史為其重點；二是古文字學。由於他一生把精力集中在這二方面，而且識度大，觸類旁通，於是對考古學、民族學、社會學、文獻學等多方面的知識也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

他的研究特色是把兩者結合起來，互相印證，利用古文字來作探索古史的工具，又以古代歷史社會背景來闡明古文字的制作及演變，這樣，許多史實可以說明，新意也可紛出。他對某些史料並不盲從，他通過對「戰國策」的研究，發現其中有關蘇秦事跡與史實不符，於是著文論證。果然，後來的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發現的「戰國縱橫家書」所記載和他所論基本一致。

同時，徐中舒對銅器銘文下過紮實功夫，不斷考察研究，他早年作的「厲氏編鐘圖釋」，考訂為春秋時音器，並考釋了它的銘文，書問世後很快得到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稱許。他的「金文叢釋釋例」又幾乎成為治金文者的必讀書。為了使古文字這項專門之學能普及流傳，他直到晚年仍雄心勃勃地推動後學去做直探堂奧的工作。

胡厚宣曾說：「徐先生的文章不空發議論，言之有物，多所創發，並像他的為人一樣，很樸實。」徐中舒他把樸實謙謹的作風運用於史學研究上，一經選定題目，就持之以恆。他又把這種

精神貫注到教育工作中，以身作則，誠意相感，青年受其引導，而成為踐履篤實的人才。

徐中舒一生不嗜煙酒，不食美食，不講究穿著，不尋求娛樂，也不喜歡社交，他從來沒有節假日，工作就是他的享受。今年八十多歲，尚耳聰目明。他辛勤耕耘，不愧為卓然師表。

在神話領域中研究

袁珂撰寫古代有成

神話是古代人們對世界起源、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的原始理解，並通過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來表現的故事和傳說。近代涉及神話研究的學者有魯迅、茅盾等人，而目前在四川的袁珂則專志於神話研究，並取得極為可喜的成績。

袁珂，學名袁聖時，筆名雨生等，一九一六年生於四川新繁縣。中學時期他廣泛閱讀古典文學名著，並在『良友畫報』、『中學生』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一九三七年，他考入四川大學，繼而轉入華西大學中文系，師事許壽裳，專攻小說史、傳記研究，三年後他完成了論文『中國小說名著四種研究』，很得許壽裳的讚賞。

他開始研究神話是在一九四六年時，那是他應許壽裳的邀請，到台灣編譯館工作。他在當編審時，工作較清閑，便常到台灣圖書館閱讀古書。由於對『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書中的古神話很感興趣，便萌發了在神話領域做些專門研究的念頭，茅盾的『中國神話研究A B C』等書，給了他相當大的啟發。他覺得把零碎

散亂的古神話資料編成一本比較嚴肅而有系統的神話書，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於是他開始收集資料，撰寫『中國古代神話』。一九四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本書，而且頗受讀者歡迎，連年再版，這也奠定了他專心做一個神話研究者的志向。

五十年代，他的『中國神話故事』、『中國神話』、『神話故事新編』三本神話普及讀物問世。由於中國神話材料散碎，必須靠有意識的積累，才能把大量的零散材料從各種古書中逐漸鉤稽出來，進行聯繫、比較、鑑別、研究。為了積累材料，袁珂通常是以卡片做主力軍，取其可分可合，可以抽換，可以補充；筆記本做後備軍，因為上圖書館方便攜帶。經過多年堅持不懈的積累，他不僅資料完整、齊備，視野逐漸擴大，並且有能力探討出一些原則性、規律性的理論。

袁珂在寫作過程中極為認真，他認為寫作時不能標新立異，勿為怪論，但也須避免不動腦筋，因襲舊說，僅以平實穩健為能事，做學問總得有一點革新的精神，有一點自己的創建和發明。他不斷鑽研，在校註『山海經』的過程中，對一般人把「經」字當作「經典」解釋覺得不妥，因而做了許多查考，最後得出結論：『山海經』的「經」字是「經歷」而非「經典」。這種解釋他是中國第一人。他的幾本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是『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中國神話史』及『山海經校註』。『詞典』是他於一九七二年初自幹校回成都後暗地裡開始編寫的，並於一九七八年初稿完成，出版前所收詞目三千餘條、五十萬字

左右，這部書不僅資料豐富，圖文並茂，而且考訂審慎，採用不少書証作釋說依據，顯示了作者的深厚工夫，還反映了他的學術觀點。袁珂在經過三十多年的鑽研後，特別是編纂神話傳說的相關資料和工具書，逐漸確立了「廣義神話」的新觀點，推動了神話學界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他在神話學研究的最大貢獻，就是對異常豐富而又極端零碎的神話資料做了詳細而又嚴謹的整理彙編，以及對『山海經』等古爰進行了周密的校註、語釋，構建起中國神話資料的龐大體系，這項巨大工程是前輩學者未能完成的。

為故宮博物院奠基

易培基遭同僚誣告

故宮博物院因其「百萬收藏」而被全世界視為中華偉大、悠久文化的象徵，盛名著於寰宇。它的首任院長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封建革命。

一九二四年，他以孫中山代表身分北上赴京，同蘇聯公使談判庚子賠款的分配事宜，時值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馮邀請國民黨人黃郛組織成立攝政內閣，易培基出任教育總長。後攝政內閣決定成立「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接收故宮，易又任善後委員會委員。次年十月十日，故宮博物院宣告成立，同時對外開放。但不及半年，段祺瑞通緝易培基。易培基被迫離京南下，參加第二次北伐戰爭。一九二八年六月，國民政府統一北平，派易培基接收故宮，次年即被正式任

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回北平後，視故宮為自己「終身之事業」。每天到院與秘書、總務一室辦公，悉心籌措，事必躬親。全院同仁亦齊心協力，使故宮的各項業務均獲很大發展。史或有稱易任院長時期為故宮歷史上的「鼎盛期」，當時

，他從社會上延請了大批專家、學者，成立了各種專門審查委員會，開始從文物的品質、名稱、時代、真偽等方面對故宮的收藏進行系統的審核與鑑定。修建了「延、北、保、壽」四個庫房，將分散於各個宮殿的文物集中存放，逐步建立起嚴格、周密的文物保密制度。開始進行有計劃的陳列，增闢了大量的專門陳列室，設立了照相室和印刷所，自己拍攝、印刷出版了各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出版了大量的墨跡、畫集和珍、善本書目及各種史料叢編、檔案集、文件集。古建築的維修、油飾工作也開展起來，還成立了消防隊與警衛隊。這些工作的規模雖然不大，而且在組織機構的設置方面亦不甚科學，但工作所涉及的範圍與工作的規則確與現在故宮博物院大致類似。故宮所獲得今日的恢弘局面顯然與這一時期所奠定的良好基礎緊密相關。

「九、一八」事變爆發，為保證故宮所藏文化精華不落於日寇之手，易培基率領全院同仁，搶選精要珍品，裝箱南運。此時，文獻館館長張繼及夫人崔振華等人指控易借職務之便，以假易真，偷換故宮珍寶、書畫等文物，於是他被迫於一九三三年十月辭去院長之職，同時提出反訴。但司法機關不予理會，易申辯無門，含冤積憤，新、舊病齊發，一九三七年九月病歿於上海。

易培基致力於故宮建設，功載史冊，不可磨滅。關於易被誣一事，當時的故宮博物院秘書吳瀛曾著「故宮盜寶案真相」，作了詳細的陳述與分析，看來是易與張繼的私人矛盾引起的。

明清社會經濟史家

傅衣凌資料被廣採

在史壇上辛勤耕耘了半個世紀，論著宏富，影響深遠的傅衣凌，是著名的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學者。他原名家麟，福建福州人，生於一九一一年五月，五歲喪母，後由繼母撫養成成人。一九三四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次年赴日本法政大學研究院攻讀社會學。當時東洋文庫藏有許多中國古籍，他經常到那裡去看書，週末又常去神保町舊書店，獵獲許多難見的材料，這些都為他日後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回國後，「七、七」事變爆發，他也投入救亡運動，在福建省抗敵後援會任編輯股股長，主編「戰地通訊」。以後雖然工作更換了幾次，但他對歷史的研究，從未停止過。有一次，因躲避日機轟炸，撤退到永安城郊黃厝村，在一間無主的破屋裡，他發現一個大箱子，打開一看，都是從明代嘉靖年間到民國的土地契約文書，其中有田地的典當買賣契約，也有金錢借貸字據及分家合約等，還有兩本記載歷年錢穀出入及物價的流水賬。於是他就利用這批資料，再查閱有關地方誌，從地權的轉移與地價、租佃、借貸等方面系統地研究永安農村社會經濟的結構。後來，他把

這些資料寫成「明清時代永安農村的社會經濟關係」等文章，這種引用大量民間資料，即用契約文書、族譜、方誌來研究經濟史的方法，不僅可以進一步開拓新資料的來源，而且還能發人之所未發。以後他又編成「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一書，書流傳到日本後，得到日本學者的重視。這時他的研究範圍，漸從福建農村經濟史的研究，擴展到商人及商業資本的研究，對一些地區性的商業集團作了細節的考察。以後又連續發表了徽州、洞庭、陝西商人、福建海商等論文。

大陸易權後，他一直在廈門大學任教，研究工作也進入了新階段。那時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史學界還很少有人作專門研究，明清經濟現象的敘述與分析幾乎還是一個空白，因此，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後，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注意，侯外廬、尚鉞等都去信商榷；日本的天野元之助教授等也去信索要文章。後來關於「紅樓夢」時代背景的討論後，許多文章才接觸到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接著就在史學界引起巨大的興趣和廣泛的注意。傅衣凌長年摸索，在搜集史料上做了開路、發凡的工作。他以人棄我取的決心，把眼光放到為人鄙視不顧的民間「雜書」，文約、遍查地方誌，文集、野史筆記以至不列經傳的譜牒、墓志銘，從中勾稽出不少有價值的社會經濟資料。他半個世紀來治史的成就，已在國內外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且不說國內，在海外，治中國明清經濟史的學者往往把他的著作當作案頭必備之書，他的一些未經審定的手稿，也被美國、香港的一些學人私相覆印，廣為傳播。（未完）